

錦州英烈傳

第一輯



中共錦州市委党史資料征集辦公室 編
錦 州 市 民 政 局

序言

今年是辽沈战役和全东北解放40周年，也是锦州第二次解放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胜利日子，为了纪念为锦州、全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为了把烈士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传给当代的广大读者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激励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勇前进，中共锦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市民政局合编出版《锦州英烈传》第一辑，这是一件具有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锦州地区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早在1923年锦州地区就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24年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锦州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活动曾威震辽西，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1942年起，我冀东区党分委又派出东进工作队和小部队配合，在凌（源）、青（龙）、绥（中）一带山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建立了县政权，领导了辽西地区人民与日军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并为我军顺利挺进东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锦州地区是主战场。我东北解放军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解放区的配合下，在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52天的浴血奋战，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47万人，使全东北获得了解放，有力地

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部《英烈传》主要收集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锦州、全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英雄事迹。他们中有我军的高级将领和战斗英雄，有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民兵英雄，也有原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有的是在锦州地区牺牲的，有的是锦州人在外地牺牲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同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他们都是以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地与敌人作斗争，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祖国的大地和五星红旗，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新中国。没有烈士们的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生活。他们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是人民心中的丰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烈士的名字和业绩将万古流芳，永垂青史。

历史的车轮已进入80年代，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十三大所制定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缅怀先烈，应该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要学习和发扬先烈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学习先烈们那种不为名不为利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022)		(1)
(422)		(17)
(122)		(36)
(042)		(42)
朱 瑞		(49)
张士毅		(73)
回忆录	深切怀念士毅同志	(87)
	怀念我的老首长张士毅同志	(102)
梁士英		(114)
马云飞		(123)
欧阳强		(129)
齐 英		(133)
才 山		(145)
艾 平		(155)
程式兰		(164)
孙瑞符		(169)
宋国祥		(175)
阎海文		(181)
石佐卿		(189)
佟励生		(198)
钟 卿		(206)
王 溥		(215)
杜宝珠		
于会川		
潘 凯		
李华春		

祝锡田.....	(220)
于海生.....	(224)
王凤林.....	(231)
刘殿祥.....	(240)
刘福余.....	(245)
毛国臣.....	(252)
李宗润.....	(260)
董万功.....	(268)
张德新.....	(278)

(27)	
(78)	
(501)	
(114)	
(152)	
(051)	
(133)	
(142)	
(102)	
(104)	
(001)	
(175)	
(181)	
(081)	
(108)	
(202)	
(212)	

朱 瑞

(1905~1948)

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瑞同志，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广大劳苦群众，于1948年10月1日在义县大凌河畔以身殉国。40年来，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时刻怀念他。

朱瑞同志，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父亲早年学武不成，后来当了农村业余“郎中”，对人宽厚、温和，深受人们尊敬。他母亲是一位性情冷静、倔强、勤俭的家庭妇女。

朱瑞同志幼年体弱多病，四五岁方能走路。他八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不识字，但常以闺中听到的千家诗：“白日依山尽”、“春眠不觉晓”等教他，他很快便记熟。朱瑞同志特别爱听故事，听到悲惨之处，常常痛哭失声，引起姐妹笑话。

朱瑞10岁入邻村私立小学读书。12岁入县立高小，该校图书馆有很多藏书，朱瑞利用课余时间几乎遍读了小说、童话、故事。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岳飞传》、《七侠五义》和《水浒传》。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岳飞传》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他还通过读报，知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李宁（即列宁）等革命说法。他把这些与“新奇”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逐渐由仰慕古代行侠尚义的侠士

转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正当朱瑞思想急剧变化的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洪流波及到了朱瑞所在的苏北小镇。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和同学们一起到各商号检查商品，搜查日货。

1920年秋，朱瑞入徐州培心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教育完全是为着灌输奴化思想和宗教迷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朱瑞入学后喜爱白话文和新文化，又受到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读了很多新书，如《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独秀文存》、《三叶集》等，粗知一些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生平新知识。他对于教会中学进行的连灵魂都浸在迷信中的思想教育非常不满。所以他便在同学中宣称自己不信教。为此，引起校方的注意。

1922年6月，一位低年级同学因星期日外出没请假，遭到校方的毒打，激起了朱瑞所在班的公愤，在朱瑞同志的带动下举行了罢课，风潮很快波及了全校。学校当局怕事态闹大，遂宣布提前放假，并开除了朱瑞等60名罢课学生。

同年秋天，朱瑞在同学的帮助下，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商业色彩很浓。朱瑞是一个立志报国，诚心求学的青年，不为环境所左右，在同班同学中，他的学业成绩非常突出。在全市性的统考中，他多次名列前茅，为学校争了光。所以，不但学校和科任教师喜欢他，同学对他也都格外敬重。

当时南京还处在军阀统治之下，政治黑暗，革命势力受到压抑。朱瑞却象一只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地经常用作文和

演讲抨击时政，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还在学校办的刊物上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徒具招牌，内容尽失，要建立真正的民国，还需革命。”朱瑞同志考入广东大学读书后，反叛思想已经形成，他曾发誓：“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这时他虽然隐隐约约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其它主义更进步、更彻底的革命道理，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是模糊的。于是，他查阅了图书馆的有关书目，拟定了读书计划，经过一年学习、钻研，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已从扑朔迷离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信仰。

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行动上也更加靠拢党组织，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称赞他是斗争中的“中坚分子。”

就在这时，苏联创立了中山大学，在广东招生，朱瑞同志决心放弃广东大学的学习，报考中山大学。他顺利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以左派青年的名义获准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12月4日，朱瑞同志和其他22名同学从珠江登船赴苏，于1926年1月12日到达莫斯科。从此，朱瑞同志迈出决定一生方向的重要一步。

1926年3月，朱瑞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苏联少共（即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思想上奠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1928年7月加入苏联共产党。

朱瑞在中山大学学了一年半，于1927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军事干部，朱瑞遵照组织的决定，于1927年秋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在炮校的两年时间里，他时刻把自己的学习同国内的武装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夜夜不倦刻苦攻读，很快成了该校中国连的高才生，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人民炮兵的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1929年夏，朱瑞在毕业考试中，笔试和实弹射击皆名列第一，受到了学校领导的嘉奖。不久，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他奉命回国，于1930年1月到达上海。由于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他没有能够同组织上及时取得联系。为了寻找党的组织，他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风险，后来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同中央组织部接上了关系。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参谋科当参谋。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急需干部，要求派人。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派去的干部接连被捕、牺牲，所以在派往武汉工作的人中流传着一句口头语：“我是扛着棺材去的。”朱瑞同志因回国才半年多，地下斗争经验还不丰富，所以中央物色人选时，并没有考虑到他。当他知道情况后，便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前去。当时中央对朱瑞同志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称赞，任他为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临行前，朱瑞同志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给家里写信说：“将去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里通信了。”

10月，朱瑞同志到达武汉，协助关向应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武汉的形势更趋严重，12月党中央作出将武汉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只留外交科、军委交通科与交通站的决定。在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撤离武汉

后，把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悉交朱瑞负责。接着朱瑞的秘书亦被逮捕。在此险境中，朱瑞镇定自若，巧妙与敌周旋，坚持斗争。直到1931年2月接到中央指示，方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中央分配朱瑞到军委兵运科工作。在此期间举办了兵运骨干训练班，经他直接派到国民党部队和兵工厂工作的即达六七十人。其中，参加组织有名的宁都起义的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即是由他直接派出的。与此同时，他还向国民党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的代表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后因上海形势恶化，经党中央决定朱瑞等于1931年12月撤离上海，赴江西苏区工作。

到达江西瑞金后，朱瑞先后任红军总司令部二科兼三科科长、五军团干部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后，中央决定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左权改任军长，朱瑞任该军政治委员。6月，朱瑞又调红三军任政治委员。在红三军时，他同军长徐彦刚共同指挥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水口战役。8月又率红三军参加乐安、宜黄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乐安、宜黄，俘敌5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12月朱瑞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他任职后狠抓政治思想工作，批判军阀主义残余，开展新旧军队对比教育，从而使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明显提高。1932年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50万兵力，分兵三路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我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隐蔽集结在黄陂以西地区。当敌人第一纵队进至我集结地区，红军分兵两翼，北上包抄。朱瑞和军团长董振堂是右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经过两天激战，歼敌五

十九师，敌五十二师被我左翼部队歼灭。3月他又同董振堂一起，指挥五军团在草台岗地区，配合一、三军团将敌十一师大部歼灭。经此两役，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我红军彻底粉碎。在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朱瑞和董振堂领导五军团在建宁地区，同数倍于我之敌进行抗击达数月之久。同志们称他是：“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1934年1月，朱瑞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8月，根据朱瑞的请求，中央调他到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长征中，他协助聂荣臻积极开展一军团的政治工作。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朱瑞十分振奋。尤其在此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1935年9月12日朱瑞列席了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揭露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局会议。

长征途中，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干部和部队宣传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他和战士一道吃野菜，睡草地，鼓励大家坚持北上。

1936年2月，朱瑞随同一军团东征。5月，凯旋归来后，红一军团又和红十五军团一起编为西征军。为了顺利打开西征的通道，朱瑞同志遵照周恩来、彭德怀的指示，同邓小平一起率四师到七营川地区，向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他拿彭德怀的亲笔信同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谈判，不仅争取何部停止同红军对抗，并且要其让出了海原、同心两地，从而使一方面军顺利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朱瑞还多次到东北军驻地向他们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他那犀利而感人肺腑的讲话，使不少东北官兵潸然泪下。1936年12

月，中央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认真负责，细致具体，作风深入，实事求是，尊重领导，团结群众，任职半年，为红二方面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受到贺龙、关向应的赞扬。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朱瑞同志被调离部队，任北方局军委书记。7月下旬到太原，后到保定，联系地下党，帮助他们拟定了在白洋淀、任邱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8月上旬回到太原。9月初由周恩来同志派往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政训处工作。10月又应国民党豫北师管区主任张轸之邀，在新乡豫北游击训练班任教官。后又被程潜委任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朱瑞利用这些合法身份，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八路军在国统区的影响和威信，并引导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后因程潜南撤，朱瑞便独自留下，并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前后共办5期，训练青年干部2000多人。抗战后期，这些青年大部分成为太行区和平原区斗争的骨干。

朱瑞同志擅长演讲，他讲话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在青年干校讲课时，每次都座无虚席，许多人没有凳子就坐在地上听。许多在“华干”学习过的人说：“朱瑞知识渊博，气质洒脱，热情似火，和蔼可亲，象块磁铁吸着我们的心。”同时他还整顿和发展了冀南、豫北特委党的工作，并创立了直南、析城山、道清等三支游击队，为这些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是他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单枪匹马，在艰难生疏的环境中，主动开拓扩展党的事业的时期。正如他在“自传”中说的，这是我“向全面领导

才能发展，最战斗、最紧张、最有成绩的工作时代。”

1938年8月，朱瑞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9月，中央和北方局任命他为八路军驻国民党河北省省主席鹿钟麟处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河北国民党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导地方党的工作。

1939年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他们到后，首先召开了山东联合大会，成立各救国会，统一了全山东的民主斗争。同时在各发展武装，改造政权，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根据地的发展。8月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委员会由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郭洪涛、陈光、黎玉组成，由朱瑞任书记。10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赴延安，中央和北方局决定由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从1939年到1943年8月，在此4年间，朱瑞作为山东敌后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山东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粉碎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开辟和扩大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10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斗争非常残酷，我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朱瑞同志的爱人、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婴儿，在1941年11月惨遭敌人杀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同时也暴露出山东分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3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来到山东进一步帮助山东分局总结检查工作，为山东党指明了斗争方向。根据少奇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改变对敌斗争策略，又进行整风，实行减租减息等方针，很快使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是年秋，朱瑞与山东分局组织科干事潘彩琴结为夫妇。

1943年9月，朱瑞奉命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山东分局书记一职由罗荣桓接任。“七大”召开之前，先后到延安的代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进行整风。朱瑞于1944年2月入中央党校学习。在整风中，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回顾历史，严于解剖自己，写出了《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5月，朱瑞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参加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春，朱瑞参加了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专题发言。

1945年6月，中央拟任朱瑞为我军副总参谋长，但朱瑞此时想的不是职位的高低，而是如何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更为有效地贡献给我军建设事业。于是他请示毛泽东主席，表示自己学过炮兵，可为我军炮兵建设起点桥梁作用，并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对我军炮兵建设的初步设想。毛主席对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军队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甚为赞赏，同意了他的请求，并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即任命他为我军刚组建的第一个炮兵学校——延安炮兵学校的代校长。从此，朱瑞怀着：“终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坚定信念，以顽强的斗志和科学精神，把全部身心投入了我军炮兵建设事业上。

日本投降后，延安炮校奉命迁往东北，准备接收日军装备，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炮兵。临行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示朱瑞同志，不仅要负责创建东北炮兵，而且要帮助其他地区建设炮兵。经过渡黄河，跨长城，日夜兼程长途跋涉，于

10月下旬到达东北。到沈阳后，情况与原设想大不一样，不仅情况复杂，秩序混乱，而且也没有日军装备可接，还面临国民党即将大举进攻的紧急状态。这时朱瑞除抓炮兵工作外，还担任东北我军后方司令。面对如此意外复杂纷乱的情况，朱瑞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发动干部献计献策。经过总结，他果断地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朱瑞同志及时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对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炮校指战员们从东起绥芬河，西到满洲里，南迄长春，北至虎林、瑷珲的广大地域内，无论城镇乡村或人烟罕见的老林深山，凡是日军驻扎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克服了远离交通干线，山高林密，土匪骚扰，供给不足，天气寒冷等困难，把搜集到的一门门大炮，一车车弹药，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往后方基地。到1946年5月，共搜集火炮700多门，炮弹50余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还有大批零件和各种器材。主要依靠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组建了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炮团、6个炮兵营、20个独立炮兵连，共计80多个炮兵连。还组建了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修械所。

——为进一步充实炮兵装备，1947年4月他又抽调两个营零4个连，分赴北安、孙吴、鸡西、绥芬河、兴安岭等地搜集武器。他们发扬吃苦耐劳，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搜集火炮98门，炮弹及引信各13万多发，连日军溃败时沉入镜泊湖的6门大炮也被捞出来。并搜集到日军丢弃的十五榴、十加等口径较大、射程较远的火炮20多门，装备了一个重炮团，这是我东北野战军第一个摩托化炮兵团。在这次搜集武器过程中涌现了以“搜炮英雄”周天才为代

表的功臣、模范100多人。在这期间，朱瑞同志曾两次带车跨过鸭绿江，与驻朝苏军远东方面军交涉，索回了苏军从东北拉走的日军溃败时遗留下的一部分火炮和弹药。这些收获为充实炮兵装备，壮大人民炮兵，提供了物质基础。

1946年5月，炮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朱瑞同志预见到炮兵部队必将有大的发展，他提出：“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办校方针。将炮校500多名干部，分配到东北各军事单位，以开办学校的精神对部队实施训练，迅速培训出一批炮兵骨干，为当时和以后部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为了适应炮兵部队的发展，东北军区决定成立炮兵调整处，由朱瑞任处长。他从全局出发，代表军区先后发布了4个炮字号命令，对全区各部队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使全区炮兵很快走上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发展的阶段。并把延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1946年10月，取消炮兵调整处，成立炮兵领导机构，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炮兵政治委员兼炮校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员兼炮校副校长，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虽然朱瑞同志工作繁忙，但他对炮校办校方针以及干部教员配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器材设备等都亲自过问。到辽沈战役前，在朱瑞直接领导下，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保证了炮兵部队发展和作战的需要。

1947年1~4月，东北我军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炮兵派出70多个连队参战，战后及时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朱瑞以实战经验总结出适应我军特点的炮兵作战原则。1947年夏、秋、冬季三大攻势之后，朱瑞又及时召

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总结实战经验，充实完善了集中作战、近迫作战、协同作战、攻坚作战和支援纵深作战等炮兵作战使用原则，使全区炮兵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即能够“快、准、猛”集中使用兵力和火力，保证大兵团作战的需要。在朱瑞直接组织领导下，东北炮兵部队的数量又有很大发展。同时，还支援了其它战区的炮兵建设。到1948年8月，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共有山炮、重迫击炮等各种火炮4700余门。这些炮兵团，人员充实，装备配套，战斗力较强，所以，这时我东北炮兵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压倒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炮兵部队，为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作好了充分准备。

1948年7月，朱瑞参加了东北军区讨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朱瑞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但他坚决要求到前方，亲自指挥炮兵部队作战，从中吸取和总结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中的炮兵作战经验。最后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9月10日，他离开哈尔滨率领部队经过长途奔袭，于9月12日进至锦州北面屏障——义县城下。而义县是锦州的门户，敌人的重要外围，是我军攻打锦州的要道。只有先打下义县，我主要从长春方向开来的大军，以及物资辎重，才能进入锦州；同时，也就掐住了锦州之敌的咽喉。这时义县四周早已被我军解放，只是义县城被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控制着。这个师在国民党部队中，又堪称精锐师团。师长王世高虽有自负之癖，但有文化、懂军事，胆大而顽固，严厉而心细，而且颇有一套施行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的伎俩。再加部队训练比较有素，防守严密，武器装备精良，80%以上是美国供给的最新武器，且有